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第二版)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Second Edition)

侯建新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

ISBN 7-04-017865-6



9 787040 178654 >

定价 33.00 元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第二版)

Western Europe and China in Transition
(Second Edition)

侯建新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西欧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故乡。对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问题的研究海内外学术界倾注了经久不衰的热情。本书将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成功置于当时经济-社会的整体架构内,探究其得以成功的根源;同时与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实证性比较,以期深化西方与中国的历史思考。作者试图从经济与社会、效率与法治、物质积累与精神积累的双向互动中,寻求社会变迁的轨迹。本书视野恢弘,实证求真,融会中西,多所创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侯建新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1
ISBN 7-04-017865-6

I. 社... II. 侯... III. 社会转型-西欧-
中国-研究生-教材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032 号

策划编辑 李海风 责任编辑 高英 封面设计 李卫青
版式设计 史新薇 责任校对 康晓燕 责任印制 杨明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总 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 销	北京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 刷	北京机工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张	20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0 000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7865-00

作者简介

侯建新,1951年生于天津市,历史学博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及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外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史学理论,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七五”、“八五”、“九五”项目和国家“十五”重点教材等,著有《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等书,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等,并发表论文近百篇。

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再版前言

本书是《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之一,2001年由济南出版社初版。承蒙学界关爱,2003年被教育部评选为全国研究生用书。时隔五年,重新读来,不少地方需要修改。由于时间仓促,也为尊重评选它为教材的专家们的意见,整体说来全书未作大改动。删去重复之处,增订一些必要的新材料,新加“近代乡村借贷比较”一章,还调换了书后的“附录”内容,以助于对全书中心的理解。总之,作为教材,希望它更适于读者的阅读与思考。

对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问题的研究,海内外仍在不断探讨之中。本书是围绕这个主题多年思考的一个结集,其主要特征是,将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成功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架构内,探究其得以成功的深层次缘由;同时与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实证性比较,以期深化这一主题,深化关于西方与中国的历史思考。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跨度大,涉猎面广,加上本人学力浅薄,书中会有诸多不完善不深入以至错谬之处,恳请读者原谅并不吝赐教。

感谢济南出版社,尤其原书责任编辑张元立,他们使该书的第一版得以问世。感谢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心的诸位同仁,切磋琢磨,砥节砺行,他们的友谊和帮助令我如沐春风。感谢关心这部书的所有前辈、朋友和读者。此外,赵文君讲师与我共同完成第十二章“近代乡村借贷比较”,孙立田副教授和龙秀清教授等重新编辑了“参考及进一步阅读书目”,研究生刘芮、孙晓明、徐华娟帮助审核引证资料和译文,还有历史教学杂志社的任世江先生、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李海风女士均提出不少好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侯建新

2005年5月5日

目 录

引言	1
----------	---

上编：西欧篇

第一章 何谓资本主义	20
一、“资本主义”概念	20
二、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主要流派	21
三、小结	32
第二章 资本来源：个人财富的普遍积累	33
一、“前原始积累”	33
二、土地产出率的增长	35
三、开拓新垦区	37
四、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	44
五、“内贸”与“外贸”	46
六、小结	50
第三章 谁为“积累”提供保障？	51
一、西欧的法律体系与庄园习惯法	51
二、劳役量限定与法庭审判	53
三、王权非生产性消费与“王在法下”传统	58
四、小结	61
第四章 特权城市与农奴制解体	63
一、建城：挣脱农奴制	63
二、特权城市——兼评《中世纪法国公社》	73
三、一个法国学者的考证	86
四、小结	93
第五章 人文主义思潮的勃兴	95
一、人文主义思潮的核心	95
二、人文主义与时代	100
三、人文主义者举证：达·芬奇	104
四、个人与上帝直接对话	109
第六章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112
一、社会交往的变化	112
二、富裕农民群体兴起	114
三、阶级结构的变化	119

四、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	122
下编：中西比较篇	
第七章 从主体权利看中西传统政治制度	128
一、“主体权利”的文本解读	129
二、西欧：原始契约性贵族等级制	136
三、中国：皇权专制主义	140
四、余论	143
第八章 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149
一、宋代劳动生产率考察，兼评“贸易决定论”	149
二、鸦片战争前的劳动生产率与乡村社会考察	157
三、近代冀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储蓄率考察	162
第九章 农业雇佣经济与雇工比较	178
一、农业雇佣经济比较	178
二、雇佣经济发展与不发展探究	185
三、雇工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比较	189
第十章 乡村基层组织比较	193
一、乡村基层组织及其管制	193
二、乡村诉讼与村规	198
三、乡村精英阶层分析	203
第十一章 近代农民生活与消费水平比较	210
一、民国年间冀中农民的生活与消费	211
二、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生活与消费	222
第十二章 近代乡村借贷比较	234
一、普遍负债是中国乡村高利贷的沃土	234
二、前近代社会英国乡村的借贷及其蜕变	240
三、现代意义上的乡村借贷制度及其比较	243
第十三章 英国历史与传统农业变革目标	250
一、世界上第一批乡村工业	250
二、高产农业探源：变革历程与目标	253
三、家庭农场主应成为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家主体	259
参考及进一步阅读书目	264
附录1 廿载不变的追求——侯建新教授访谈录	277
附录2 研究生课堂讲坛：主体权利与西欧中古社会演进	289
附录3 应当关注经济活动中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读后	305

引 言

一、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起始年代及内容

资本主义发生,从传统农业世界转向现代工业世界,大概是人类社会迄今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社会转型,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大转变的起点始于何时,历史学家各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以15—16世纪作为大转变起点的说法较为普遍。眼下,以某次革命或重大政治事件作为标志的观点依然存在,不过似乎不再占主流地位,人们越来越看重普通民众经济和社会生活变化所蕴示的深层含义,然而经济和社会方面比在其他方面往往更难发现类似“接缝”那样的痕迹,因而也就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时代分界线。也许本来就不存在一条明确分界线。用F.W. 梅特兰的话讲,“历史看上去确实是一张无缝的网”^①。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克拉潘则称:“历史是一件无缝的天衣……这件历史天衣的变化往往是极其缓慢而难于察觉的。”“可是,十六世纪初叶所能追溯的那些变化却没有被忽略,这些变化几乎暗示出一道接缝和一块新的材料。”于是,他索性将大转变的起始时间定于公元一千五百年^②,相信不会有太大误差,而且容易记忆。此种观点以及时代分界线的确定似乎未尝不可。

这一大转变在空间上发祥于何地,亦有定论。资本主义起源于欧亚大陆的西端,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则是中国:远东和远西,恰是我们要进行对照和比较的两个不同范式。中国步入社会转型,是在与西欧几乎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其运行轨迹及转型期的起止年代亦不相同。如果说19世纪中叶后以英国为领头羊的西欧国家依次完成了工业化,那么中国的社会转型时至今日仍在进行中。用“工业化”这个标题来概括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已为经济史和社会史学界广泛接受。可是,工业化一旦开始进行,就不仅仅是工业化问题,它会带来一系列的

① 转引自哈罗德·J.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页。

② 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一七五〇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57页。

社会矛盾,从而与前工业社会产生种种差别与对立。^①

因此,社会转变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非经济领域,诸如知识增长和各级教育水平提高,群众性政治参与,民主化、法治化的社会决策和管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各个方面。西方现代化研究中的结构功能学派因强调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转变而取得很大影响。他们认为,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就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这些特性可大致概括为:(1)民主化;(2)法治化;(3)工业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会阶层流动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识科学化;(11)信息传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②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这几方面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可也不能缓急悬殊过甚,过分的不平衡最终会损害发展较快的指标,从而影响、以至于打断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往往片面重视经济的、可测量的指标而忽视“软指标”。例如,单就工业化而言,苏联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是可观的,教育普及率和知识科学化的水平也不低,但有的环节如某些社会人文指数却相当薄弱,结果严重失调,不得不进行“休克”治疗。显然,社会转型是一个包罗宏富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罗荣渠对此已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入的评析,应当成为后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③

二、工业化是一种偶然?

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或者说让我更迷惑因而更有吸引力的问题是,这一切最初是如何启动的?如果不是上帝之手,那么是何种动力使英伦三岛继而使西欧捷足先登,率先跻身于工业化之路?它们的成功包含一些普适性的因素和原则,还是一种偶然?有无普遍性是有无可比性的前提条件之一,没有统一性,中西社会也就谈不到比较。

新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表明,把英国工业革命归因于一种资源的发现因而纯属偶然的观点,仍然不失为一个流派。这篇论文的作者是现任美

^① 参见 Kerr, Clark, et al.,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the problems of labor and management in economic growth*, California, 1973.

^② 杨国枢:《现代化的心理适应》,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1978 年版,第 24 页。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一编,第一章。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主任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教授,据说该文反映了他的《大分流》一书的基本观点,后者最近因获得颇有地位的费正清奖而在美国史学界走红。他认为: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即“欧洲奇迹”,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美洲新大陆殖民(被称为经济发展区与边陲地区的关系)这两项“根本性的突破”,才使西欧胜出。关于煤的广泛使用,他说:

“这个突破需要技术的创新以及地理条件的配合。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市区内对煤需求量极大,并有一批从事马达、蒸汽机等机器改良的工匠,对发展煤业极有助益。反观中国,煤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是山西,距离长江三角洲超过一千英里,就像欧洲的煤产大部分都在喀尔巴阡山脉下。技术的挑战也不同。英国的矿藏需要不断地把水抽出去,而燃煤蒸汽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后来机器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了。……相形之下,中国最大的煤藏在矿坑深处,通风是一大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我们更难想象(英国——引者注)早期如何突破有机经济的限制;却更可能会看到西欧就像长江下游一样,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压力下最后将吞噬精密分工的成果。”

另一项“突破”是指新大陆等殖民地的开发与利用。新大陆新增加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西欧,如矿物燃料、糖、棉花、谷物、牛肉、木材等,缓解了西欧土地资源的紧张程度,例如,“1801年英国进口的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假如完全要在当地生产的话,英国需要用85万至120万英亩的小麦良田来种植甘蔗”,在那样的情况下,英国也会像东亚一样走上劳动力密集的道路,“结果可能会使某些突破(如工业革命及19世纪的农业革命——原作者注)不可能发生。”^①

彭慕兰从能源的角度探讨英国工业革命,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检视欧洲,似乎有一定的新意。彭氏把煤矿尤其是浅层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非不存在这些条件。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煤炭的最早记载,宋元时期已较为普遍。煤炭交易活跃,宋代“石炭”矿产管理曾设有专门官吏,并实行专卖。河南鹤壁市宋代煤矿遗址规模颇大,可同时容纳数百名矿工工作,布局井然,技术可观:“跳格式”开采法、提水技术等都达到一定水平。宋人沈括预言,作为能源煤炭比林木更

^① 见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该文为2001年5月20—22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笔者有幸做彭氏报告的评论人,因此较早读到这篇论文。

有前途,“此物后必大行于世”^①。鹤壁矿是地下矿,而且不是中国人开采的第一个地下矿,按顾炎武考证,两汉时即已开采地下煤矿了。^②其实人们使用和开采煤炭,总是从使用“露头煤”即浅层矿开始,从地表到地下是一个飞跃,也是长期实践的结果。显然,在开采地下矿以前,早就有浅层矿的开采。事实上也是这样。中国不仅有彭慕兰言及的位于山西等处的深层煤矿,也不乏他十分感兴趣的浅层煤矿,例如距长江三角洲不远的山东枣庄煤矿就是著名的“露头矿”。1801年(嘉庆六年)矗立于枣庄的“窑神庙碑刻”即《创建窑神庙记》载道:“吾邑之有煤窑开自前朝万历间,迄于今,掘取殆遍”,也就是说,自16世纪中后期始,枣庄浅层煤矿就有开采的记载,此时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两三百年前。

笔者向彭慕兰提出的问题颇为简单:中国不缺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发生工业革命,或者说没有使中国免于走上劳动力密集的道路?另一个就英国工业革命而言更直接的问题是,“伦敦附近有大大小小露出地表的煤层”,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为什么在18世纪中叶以前未被发现和利用?“发现”也是一种偶然吗?当然彭氏还提到相关的技术条件,可技术问题不是彭氏学说的核心,因为即使是技术问题也有一个为什么在18世纪发明和使用的问题。

笔者认为,煤的利用和某项技术的发明、利用一样,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与社会结构、社会分工和整个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否则即使发现了某项矿物燃料或某项技术,也不会被社会广泛承认和运用,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工业革命前800年,苏轼在徐州西南山发现了煤矿,并冶铁造兵器。用煤炭冶铁,火力强,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提高了金属质量,苏轼赋诗咏之,称赞所冶兵器“犀利胜常”^③;但他不知“工业化”为何物。彭慕兰将一种能源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决定地位的观点难以让我们接受,他关于1800年前中国每人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同时期西欧消费水平的

① 春秋、战国时代的煤炭记载见于《山海经》,煤炭被称为“石涅”或“涅土”。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煤炭逐渐成为并不罕见的燃料,宋代实行煤炭专卖,开封一带有普通百姓用煤取暖做饭的记载,见《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梦溪笔谈》有关于陕西西北部“鄜延境内”(今陕西省富县和肤施县境内)煤矿的记载,言及“选煤人盖知石烟之利也”,并预言作为能源比林木更有前途,“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石炭》。

③ 据苏轼:《石炭诗·小引》。

估计^①,亦令人怀疑。

彭氏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偶然性的观点不是孤立的^②,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强调矿物资源尤其是煤矿开采,对工业革命本质性的突破作用^③;至于海外殖民的作用,同样不是新话题,下文还要论及。

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一书,虽然没有自称是西欧崛起偶然论者,但与彭慕兰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脱离了人类社会本身来追寻中西社会发展和不发展的原因。琼斯在该书中特别强调地理环境的因素,他认为欧洲农牧结合的乡村产业结构、较早发达的商品经济、君弱民强的国家组织形式等,都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关。西欧河湖交错,雨量充沛,潮湿温和,十分适合牧草的生长;而且山地、平原和沼泽应有尽有,地理与气候条件使欧洲的畜牧业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是中世纪形成农牧混合结构的基础。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平原为中心形成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国小、国君权力小,而且很难完全自给自足,再加地形、风情、物产各异,势必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频繁交易,商业发展。各小国君主都注重从商业中获利,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出现损害商业的政策和行为,由于没有东方大国的强权,商人易于起而抗争,坚持自己的权益,所以西欧从中世纪以来就逐渐形成市场经济,而东方大国则依靠强权限制商业,长期推行抑商政策。此外,西欧人口也比亚洲少,所以土地、牲畜、木材等人均自然资源占有也优于亚洲,易于资金积累。后来的海外殖民,继续扩大了这样的优势^④。琼斯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欧洲优越感的气息。他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的一些欧洲优越性颇为牵强;即使这些假定符合事实,然而从地理环境出发进行推导的逻辑似乎也难以成

① 彭慕兰估计,1750年左右,中国平均每人糖的消费量为3.8~5.0磅;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最高每人消费量达10磅。茶叶,1840年左右每人消费量0.7磅。棉布每人6.2~8.3磅,再加麻布每人约4磅的消费,见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无论糖、茶和布匹,消费水平都不低于西欧国家,甚至比英国以外的西欧国家还高。这些数据和估计,都是令人怀疑的,此处不论。

② 里格利认为,工业化即以矿物能源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与此前的社会发展没有必然联系,见E.A. Wrigley,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1988。斯努克斯也认为以煤铁为基础的现代化与亚当·斯密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无因果联系,见Graeme Donald Snooks, *W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cessa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Press, 1994。国内也有学者持相似观点,见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③ 可参见Nef, John Ulric,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on, 1932。

④ E. L. Jones, *The Miracle of Europe*, Cambridge, 1985。可参阅马克垚的有关介绍和评论,见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立:完全排除社会,排除社会中人的活动的主观能动性,无论对于欧洲还是亚洲都是不真实的。琼斯描述东西方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实际上是命定的,因而对人和社会而言也是偶然的。

人均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以及自然地理环境都是重要的,但是,难以将这些因素与社会性质的改变直接挂钩。世界毕竟是人的世界,是越来越打上人类社会印记的世界;而人及人类社会是有统一性和同一性的。笔者更倾向于从人类社会内部原因寻求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据。

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寻求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由于自己的原因,也开始关心别人,尤其关心西方,所以也可以说从那时就开始了中西历史与社会的比较研究。说“落后”是因为“挨打”,大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了。不过,过分强调东方和西方的特殊性及各自的合理性,或者否认它们的基本差异,认为东西方差不多即所谓“东不东,西不西”,还是不乏主张者。从学理层面上讲,无可厚非,但对实际问题的阐释上,似乎有一些问题,即如果认为东西方不存在着重要差异,如何回答中国近代的落伍?不管以前曾经如何辉煌,而中国在近几个世纪的贫穷、愚昧和落后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否则为何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致不得不“救亡”、“图存”?

我以为,中国的落伍像西方的崛起一样,并非偶然。一方面,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东方或西方都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其本质属性,^①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欧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差异,这种差异从时间上讲并非源自鸦片战争,并非源自满清王朝,它们实际上很早就存在,无论中国汉唐“盛世”,还是西欧“黑暗的中世纪”,都已含蕴其间了!戴逸先生曾把清帝比喻为体育场上的第四名选手,其失败不是他们的低能和失误,当他们接过前一名选手的接力棒时,“同时也接过了这种文明所能发挥的竞跑能力”,以及遗留下来的经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从而说明中

^①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从宏观上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物的依赖关系”的时代和“自由个性”的时代。原文是:“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国的落后不是明清时代民族退化,而是根植于很早以前。^①此番分析颇为深刻,耐人寻味。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差异不是数量上的,也不是某种或若干种现象,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着以后的发展方向。西欧与中国的传统因素不同——主要是法律政治层面的传统因素不同,所以它们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程度也就不同:当近代文明来临时,一个似乎水到渠成;一个则百转千回仍不得要领,“第四棒”的成败记录是不言自明的。此点提示我们,中西历史比较的关键是探究前工业社会里的结构性的差异。

三、“前原始积累”:生产者个体的普遍积累

为了探讨西欧现代化起源问题,我们不得不走进中世纪,走进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乡村经济与社会。在对英国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乡村社会的探讨中,从直观上讲,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格外关注,一是生产者的人均产量,即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富裕农民阶层的兴起。英国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农业劳动生产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6世纪后,英国人口成倍增长,然而人均产量增长的更快,这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这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第一次能够持续向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不断攀升的生活水准,从而超越了“马尔萨斯危机”,取得工业社会的首张入场券。一系列数据表明,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出现,不是以农业的萎缩为代价,也不是靠“挤压”^②、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恰好相反,在资本主义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吞噬掉之前,它是个体农民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普遍发展为其发展的基石;也正是以此为前提,约曼(Yeoman)那样的英国富裕农民阶层才脱颖而出。对于少部

^① 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中的一段话颇令人寻味与思考,他说:“历史不是体育场上的接力赛跑,在体育场上,前三名选手都跑在别人的前头,但竞赛最后还是失败了,人们理所当然的要责怪第四名选手的低能和失误。康熙和乾隆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但按历史序列而言他们正好处在第四位选手的尴尬位子上。应该说的是:体育场上,每名选手的竞跑能力只属于个人的,而历史接力赛中却不是这样,因为这是几种文明之间的竞赛,每个选手都代表着这种文明所特有的速度、耐力和精神状态。当后一名选手接过前一名选手的接力棒时,也接过了这种文明所能发挥的竞跑能力。乾隆帝的思想和政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完全从头脑里想出来的,而是孕育于中国长期的历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见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 “挤压”一词系斯大林提出,他说,为了工业化,农民除向国家缴纳一般税外,“在购买工业品时还因为价格较高还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二”,并把这种缴纳称为“贡税”。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9~140页。

分人在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中坚骨干作用,虽不能估计过高,却绝不能忽视。富裕农民是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前身,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农村的“脊梁”^①,是农业现代化的发起人,也是农村现代化的载体。由英国约曼,联想起其他一些国家社会转型时期“富农”之命运,虽然历史条件有所不同,可也并非毫无同一性而言。曾对中国及东欧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的苏联农业政策,后来被人们归纳为“斯大林模式”。该模式认为,在战略目标上谋求以最快的速度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工工业,并最大限度地 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来;利用高额“贡税”^②等手段对农民实施挤压甚至剥夺。他们把农业看作工业化的祭品,对富农实行剥夺、驱逐,直至发动消灭富农运动,^③而整个农民群体都被置于二等公民的地位。^④这与托洛斯基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理论如出一辙。该理论认为西方的原始积累靠掠夺殖民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得不依赖于剥夺农民。这既是对社会主义的误导,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误读。

何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原始积累仅是对外掠夺殖民地、对内掠夺小农吗?从历史上看,上古的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中古早期的北欧海盗维金人,都有过著名的海外掠夺与殖民经历,可所获财富似与资本主义无缘。近代以来,英国最先兴起资本主义,然而最早进行海外殖民与掠夺的却不是英国,而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者并未因成功、大规模的海外掠夺而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久久地滞留于农业社会。海外掠夺仅是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外部条件之一,资本主义发生的根本依据在于本身的内部环境。英国实际上是先资本主义而后殖民、掠夺,不是相反。如果不是把资本主义肤浅、简单地仅理解为一笔财富而是视作一个有系统的社会机制的话,那么我们说,社会机制是逐渐发育形成的,不是在一个早晨靠暴力掠夺来的。

对农民的剥夺亦如是,剥夺本身同样不能说明问题。自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就有对臣民、对生产者的暴力剥夺。这种剥夺在人类社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剥夺本身并不产生资本主义。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剥夺农民并大规模地兼并土地,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周

①② H. Heato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New York, 1948, pp. 310 - 311.

③ 伊弗尼茨基:《农村的阶级斗争和把富农作为阶级消灭》,转引并可参阅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5 - 354 页。

④ 农民在政治上也不平等。农民的选举权长期与工人不一样,农民每 12.5 万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工人每 2.5 万人就能选一名代表。农民没有身份证,不经基层政权批准不得随意离开居住地等。

期性地出现,同样不等同于原始积累。英国的圈地运动,不时伴有对农民的暴力驱逐,从而加快地产集中,应当承认暴力对农业资本主义化有一定的作用,不过,不可把这样的作用过分夸大。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英国农村上百年乃至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其基本要素在圈地运动前业已基本形成,暴力不过是催化剂。近年研究成果表明,圈地运动主要还是靠经济的、市场的手段完成的^①。原始积累中的暴力乃至社会的紊乱与无序,是新生儿诞生前的阵痛与不安。痛苦、暴力及某种程度的无序是西欧剧烈转变时期的社会表象之一,难以将其认作原始积累的全部属性。什么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暴力积累;同时原始积累也是市场积累,重要的是它开辟了市场积累的道路。

西欧的原始积累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在所谓原始积累之前,西欧已经经历了长时期、普遍的小规模积累,笔者称之为“前原始积累”^②。包括大量数据在内的史实表明,在较为剧烈的原始积累前,西欧农村经济与社会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是个体农民普遍的相对富足而不是普遍的贫困孕育了资本积累的基础。说到底,资本积累,主要取决于基本生产者个体的生产、消费、剩余与积累的状况。一部分富裕农民乘势崛起,并与富裕市民、商人及资产阶级化的乡绅、骑士融为一体,成为主要纳税人,成为社会的“中等阶级”,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他们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

个体农民的生产、消费、剩余与积累状况,或者说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是中世纪农业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亚当·斯密和重农学派无不正确地认为,农村产品的增加和剩余,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斯密说:“一家的劳动,能供给二家的食物,于是半数人口的劳动便足以生产供给全社会的食物,所以其余半数,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的劳动,能用来生产其他物品,即用以满足人类其他欲望和嗜好。”^③ 马克思也明确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④”。中国自明清至 20 世纪上半叶劳动生产率呈停滞乃至下降态势,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及西欧形成鲜明对照。据笔者推算,就粮食生产率而言,西欧以英国为例,中古晚期比中期提高

① 参阅 P. Kriedte, *Peasants, 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00-1800*, Cambridge, 1983, p. 24.

② 侯建新:《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法律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157 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85 页。